

#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三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三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Zhongguogongchandang Shigao

(第三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187,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7,500

书号 11001·624 定价 1.0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VI28/19

## 说 明

《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的编写工作始于一九六一年。当时由我室和我校部分学员共同写成初稿，并在内部印发征求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初稿的修改工作一直未能继续下去。从一九七九年，为适应我校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中共党史专业的教学需要，我们把原稿作了改写，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一九五六年的历史，准备分为五个分册（过去曾计划分为四个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分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党在北伐战争时期”；第二分册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分册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四分册为“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五分册为“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历史，有待今后继续编写。

本书由李践为同志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主要有以下同志：

第一分册：王渔，周养儒，陈登才。

第二分册：刘经宇，王荣先。

第三分册：肖一平，王秀鑫。

第四分册：何明，潘世超，翁仲二。

第五分册：张弓，林邦光。

我室其他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做了许多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一些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同志对本书内容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 目 录

## 第 四 编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和统一战线中的 独立自主 .....	1
第一节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 外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 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洛川会 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 .....	1
第二节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八路军在华北前线的胜利 出击。新四军的成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	1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	39
第四节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王明 的新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	52
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的 反共投降逆流 .....	67
第一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粉碎国民 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	67

第二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78
第三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	93
第四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111
<b>第十四章</b>	<b>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和巩固解放区而斗争</b> ·····	<b>127</b>
第一节	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12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142
第三节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159
第四节	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英勇斗争·····	170
<b>第十五章</b>	<b>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b> ·····	<b>188</b>
第一节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制止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88
第二节	国民党战场再一次大溃败。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美蒋加紧勾结·····	19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16
第四节	八路军、新四军一九四五年的夏季攻势。苏联对日宣战。解放区军民进行全面反攻。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230
	<b>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小结</b> ·····	<b>245</b>

## 第四编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

---

## 第十二章

###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 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第一节**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洛川会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灭亡中国，变中国为独占的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的方针。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紧准备对中国本部大举进攻，妄图迅速灭亡全中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丰台的“驻屯军”，借口一名日本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进



行搜查，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双方正在交涉时，日军竟向驻防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芦沟桥地方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部猖狂进攻，中国守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爆发。日寇随即向华北大量增兵，战事日益扩大。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军参谋本部策划进攻上海，扩大战争：八月九日，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名官兵驾驶汽车到虹桥机场挑衅，在中国守军的武装自卫中被击毙。日寇又以此为借口，增调军舰，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我上海守军在各界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内阶级关系以及对外关系，都发生了新的急剧的变化，国内外形势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

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情况是：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日益强大，蒸蒸日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恢复，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却又爆发了新的、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新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随后波及英、法等国。新的经济危机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丧失了殖民地或基本上没有获得新殖民地的德、意、日三国，由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极力要求改变旧的世界秩序，与美、英、法等国重新分割殖民地。而这种企图绝不是经过和平协商所能实现的。为了逃避经济危机的袭击，为了满足向外扩张的野心，最富侵略性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便把本国的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加紧镇压其国内人民革命运动的同时，首先向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并积极准备发动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世界大战。在西方，德国

法西斯为要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以大炮代黄油”的口号，搜刮了大约九百亿马克作为军事开支，妄图称霸欧、非两洲。一九三六年，德意联军进攻西班牙共和国。一九三六年底，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协定，正式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在东方，一九三六年八月，广田内阁确定了“确保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日本政府的军事预算增加到三十多亿日元。一九三七年五月，近卫文麿组成日本新内阁，积极推行其独霸东亚的侵略计划，而独占中国则是这个侵略计划的第一步。为适应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关东军提出“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的作战意见书。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正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向苏联一再挑战，以便利用这种姿态引诱执行反苏政策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对它的侵华政策妥协让步。

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既是进攻弱小国家，也是对英、美、法霸权地位的严重冲击。然而，英、美、法却妄图以牺牲弱小民族为代价，把法西斯侵略者的矛头引向苏联。因此，它们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一向采取阴险恶毒的“不干涉”政策，即“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以便从中渔利。

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相反，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更加巩固和强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坚强堡垒。一九三七年四月，苏联以四年零三个月时间，提前和超额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三七年底，工业生产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七倍以上，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国民收入从一九三三年的四百八十五亿卢布增长到一九三八年的一千零五十亿卢布。国内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各族人民的友谊也更加巩固。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严重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地位，有力地推动和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一贯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列，并一再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便制止法西斯侵略。

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围绕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方面基本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是十分凶恶、非常狡猾的侵略者，在芦沟桥事变之后，企图一举灭亡全中国，它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人民的革命势力，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但他们的力量太小，还不能发生严重的影响。德意法西斯为了它们在欧洲的利益，同日本结成了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它们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第二种力量是苏联。当时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朋友。芦沟桥事变后，苏联坚决执行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与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又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援助中国抗战。同时，苏联又时时警惕英美帝国主义挑起日苏战争和苏德战争的阴谋诡计，避开其“坐山观虎斗”的圈套。苏联的政策既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第三种力量是英美。英美帝国主义当时既不同于日本和德意法西斯，更不同于苏联。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进攻，夺取了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威胁到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然而，英美既不愿意日本夺取它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又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而且当时它们正忙于应付由德意所引起的西方紧张局势，无力兼顾东方。因

此，它们一方面主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并给中国一定的援助，企图借以拖住日本；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寻求妥协，极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由于英美当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这种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国人民就针锋相对地对它们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尽量利用它们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联合它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又时时警惕和反对它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内方面，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人民。芦沟桥事变后，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涨。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决心保卫祖国。在人民当中，工人阶级是抗日战争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则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和中心支柱。农民阶级是抗日战争的基本力量，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来源于广大农民。抗战如果离开了农民，也就失掉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充分地发动和武装农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外，不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站在抗日方面，而且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因此，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极其广泛的。

第二种力量是汉奸。汉奸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中华民族败类的。反动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是汉奸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和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曾用很大力量收买中国最反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他民族败类充当汉奸，国民党长期的反动政策也助长了汉奸的猖狂活动。而且国民党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党部，就长期地隐藏着一批汉奸、亲日派，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内的汪精卫一派就公开地投降了日本。但是，汉奸究竟为数很少，并且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和

唾弃。

第三种力量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国民党内，有赞成抗日民主的分子，也有暗藏的汉奸，但其主体则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即国民党顽固派。他们既不同于汉奸，也不同于坚决抗日的人民大众。这个集团，在芦沟桥事变以前，曾长期执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一心一意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一味妥协让步，反对抗日，置民族危急存亡于不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起来抗日，这是因为：第一，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对他们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抗日，否则，全国人民和许多有组织的抗日力量将自动起来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将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和坚决的亡华政策，直接地威胁着他们的政权和财权，使得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此时再也无法调和；第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第四，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他们的推动作用。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就表现了他们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要抗日，也要其他势力抗日，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他们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并希望能够速胜。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共反人民，不愿人民起来抗日，不给人民以抗日民主的自由权利，极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特别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他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推向最前线和敌人后方去担负最艰巨的作战任务，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帝国主义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其他抗日势力。他们不相信依靠中国本身的力量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援助上，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上。他们希望很快地引起英美对日本的干涉，由英美特别是美国代它抗

日，以便保存和积蓄他们的武装力量，准备将来再次发动反革命内战，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维持其反动统治。针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两面政策，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与蒋介石集团进行一定的联合，以便推动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又需要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广泛的同盟者。尽管其中有一些力量是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但却是可以争取、可以利用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由于上述国际国内条件，形成了抗日战争中极端复杂的形势：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抗战并取得胜利，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否则，将要犯“左”的错误。但如只强调民族斗争而无视或否认阶级斗争，则将要犯右的错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巨大的努力。七月八日，芦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指出，“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并且表示：我红军战士决心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协议，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提出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主政



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四项保证，约定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但蒋介石对此尽力拖延，迟迟不予公布。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为代表，在江西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提出，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还提出了开放民众运动、释放政治犯和红军改名等具体建议。这时，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他“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坚决实行全国抗战，反对一切对日寇的让步妥协。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才于七月三十一日，将上海爱国运动七个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由苏州监狱释放。八月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去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协商共同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接受了将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等项建议。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于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sup>①</sup>“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sup>②</sup>

---

①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是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的，这种矛盾集中地表现为国共两党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的斗争，即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所代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战，是从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是为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国民党所主张的抗战则相反，只从一党一派的私利出发，从保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主子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出发。对于这种复杂的政治情势，毛泽东及时地作了正确的估计，他指出，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毛泽东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一条是共产党为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一条是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充分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此，就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自由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则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拒绝其他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改革，主张只由他的政府和军队抗战，坚决反对人民起来抗战，不给人民以抗日的民主自由权利，不允许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显然，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路线；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则是将抗日战争引向失败的路线。

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从抗战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如从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到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之前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始终表现摇摆不定，对日



寇侵略毫无抵抗的决心，时时准备妥协投降。当时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曾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张；蒋介石虽有一定转变，于七月十七日表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又声言：“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支援平津前线，反而指使冀察当局与日寇进行秘密的“和平”谈判。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决心迅速吞并全中国，它利用“谈判”时间把大量侵略军调运华北，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北平、天津发起总攻。在国民党军政当局缺乏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北平、天津以及平津全线，迅速沦于敌手。接着，日军又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西、向南推进。八月十三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矛头直指南京和武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止境的进攻，严重地威胁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这时，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宣布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战，但它却实行一条反对人民战争的片面抗战路线。宣扬“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限制群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要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

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除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之外，还先后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重要著作，代表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方针和途径，说明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共产党所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所代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斗争。上述著作指出，两条抗战路线代表着两个前途：国民党的路线代表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代表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因而，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的